

# 中国古代商人及商业史研究的宏观思考 与个案整合

——陈支平《民间文书与东南族商研究》评介

刘婷玉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0-422x(2009) 04-0103-03

中国古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历史的研究,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亦曾在上世纪随着史学界“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而备受关注,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史研究的衰落使其稍显沉寂,而近些年来商品经济发展高潮迭起,商人自我价值认知的需求凸显,随之涌现的关于中国古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的研究论著,尤其是区域性商人群体研究的论著,数量可观,有真正学术创见和严肃学术思考者却凤毛麟角。在此情况下,陈支平教授的新著《民间文书与东南族商研究》的出版则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学术典范意义了。作者对于明清时期东南族商所进行的研究,建立在对闽台地区五百多张有关族商的民间文书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将地域性的细部研究、个案追索与对宏观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大势有机地结合起来,旨在“从商人及其资本的内部构造来探讨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由于这种复杂关系所产生的商人群体、资本群体的运作过程与模式。”由此阐发的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路径依赖的诸多反思更是振聋发聩。

《民间文书与东南族商研究》综合了作者已饶有建树的区域经济史、商人与商业史和家族制度文化以及民间文书等诸多领域,前后九章内容的写作历经二十余年,确是作者积年的

心血凝聚。由此呈现的对中国古代商业及商人历史研究的反思与理论开创,更是将看似独立的个案研究以无形线索紧密联结,处处体现着对国家制度与基层社会之间实践逻辑的学术关注。本书的《导论》部分即对以往中国古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研究中,以欧洲封建社会的历史经验来对中国的情况作出的理论预设进行了反驳,从对中国古代商人产生的渊源、模糊的身份界限以及对历代“重农抑商”政策的重新考量出发,反思了欧洲经验预设的削足适履之处。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商业及商人的产生历史很早,商品经济与农业经济在更多的场合里是作为经济的共生体而长期存在的。中国古代商人的发展与停滞,主要取决于国家与政治体制的变迁,而不是自然经济结构的制约。随着中国历史上商人及商品经济的波浪式进步,中国的国家与政治体制、文化观念以及社会形态诸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潜生出包容多元经济向前发展的因素。国家与政治体制的强势,决定了中国历史上商人及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基本上必须沿着自上而下变革的道路前进。由此引入的对经济基础与社会进步的固定单向思维模式的反思,对国家政策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之于商业影响的考量,乃至明中后期在中国文化意识中开始形成的多元经济的价值观念,都成为之后对东南族商极具“弹性”的家族、乡族运作

[收稿日期] 2009-08-13

方式进行分析的重要理论构架。

所谓“族商”，作者认为它其实是一个方法论上的概念，不应当做空间和时间界限的严格分割。“简单地说，就是那些与本土家族、乡族保持比较密切关系的商人”。族商的运作机制所体现出的，并非以往学者所断言的所谓原始村社制的残留，传统的家族、乡族制度及其组织作为明清以来社会基层的基本构造，相当程度的体现出其对商人们的经营活动的促进作用乃至对商业市场经济的适应性。与此同时进行的族商社会地位向“商绅”的转变，进一步凸显了商人及商业资本运作中商人个体素质等不确定因素，在一个缺乏制度性的商业市场社会环境里的重要影响，这也正是为以往的研究者所忽视的部分。

书中明清时期闽台族商的个案分析，均在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碑刻等民间文献的基础上复原出福建商人以乡族、家族为依托进行闽台贸易并定居台湾的群像，但侧重各有不同。第二章《清代泉州晋江沿海商人研究》对清中期以来晋江商人的关注重点在于商业行为中的乡族互助关系，以及超越经济关系的乡族复杂关系对商业资本发展的影响。以晋江商人中的蔡氏一族为例，作者从族谱资料 and 分家阄书出发细致考察了蔡氏族商多样化的财产结构，以及在乡族、家族框架下集资合股的资本组合方式是如何形成了从疏远联合向族人联合的趋向，并由此引发了对以往乡族、家族制度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传统说法的反思。

第三章《清代泉州黄氏郊商研究》以作者收集的泉州黄氏郊商的家族文书资料弥补了以往郊商研究中文献资料欠缺的遗憾，细致描绘了黄氏族人从康熙后期开始赴台经商并往返泉州、鹿港之间设立郊行的经营过程，重点在于考察郊商发展与其家族内部传承关系的紧密联系。作者发现所谓的族商，并不是在家族内普遍分布的，他们以最近亲的血缘关系为核心，逐步扩大到本家族、本宗族以及姑表亲戚，进而再向以地缘为纽带的同村、同乡、同县以及同府、同省的关系发展。作者在本章中亦对族人黄约亭行为意趣和文化意识的精彩分析，通过对《约亭公自记年谱》中着意张扬的行善乡里以

及最热衷的鬼神信仰的条理，为我们展现了区域经济史研究更多彩的可能性。

第四章《台湾杨氏族商的经营方式》通过分析乾隆年间由福建同安迁台的杨氏族商的殖产过程及商业经营状况，回应了以往学界对于传统家族制度所作的片面批评。杨氏家族在清代台湾生产资源较为丰富、市场条件相对良好的社会环境里，繁衍经营，历经近 200 年的殖产与分家析产，家族规模与经济实力并没有日益细分萎缩化，相反地不断有所扩展壮大。在另一方面，中国家族制度所具有的包容性和适他性的文化特征，使得杨氏家族在清代后期社会环境与社会经济不断变化的情景下，能够不失时机地适应商业市场经济变化的潮流，以传统的家族共有财产，直接投资于工商业活动。这也揭示了中国传统家族制度完全有可能在近现代的社会经济变迁中，发挥比较积极的适应和促进工商业市场经济进步的作用。

第五章《从契约文书看清代泉州黄宗汉家族的工商业兴衰历史》的写作，产生于作者对清代社会经济发展演变轨迹被人为切断的反思，试图通过对黄宗汉家族这样一个有政治特权背景又涉足于工商业乃至近代实业的家族谱系研究，来追寻明清以来中国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传承脉络。由黄宗汉家族工商业的命运变迁，作者认为，中国近现代的工商业，与鸦片战争以前的社会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某种传承关系；中国传统社会里的地主、官僚、高利贷者们，只要能够顺应社会经济变化的潮流，吸取先进的经营方式，也完全可以直接转化为近现代商业的企业主。

第六章《清代闽台商人间经济纠纷的案例》的着眼点在于闽台商人与两地乡族相互结合的特征，由此进行了对非乡族关系间、乡族关系间的纠纷诉讼案例的分析，视线逐渐由官府权威向乡族权威转移，从而引出了对乡族的习惯法的探讨。作者认为乡族习惯法形成的最基本的原则即是“尽可能地维护乡族、家族内部的和睦相处”，在族内调解之时不会“一味地根据经济关系的公平原则来判断事例，而是需要根据乡族、家族内部的平均主义观念和衰富益寡的思路展开的。”

第七章《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体现的是作者早年进行东南族商研究的学术思考,放在此处,颇有些使“今日之我”相见于“昨日之我”的意味。其时所考察的明清时期四堡族商的家族组织、经营方式及若干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以及四堡族商作为一个内地型的地方性商帮的特点,无疑是对之前几章偏重于带有海洋文化外向型色彩的族商研究的一种补强。

第八章《明代民间文献中的福建族商史料》为全书提供了更深邃的历史脉络。《鉴湖张氏宗谱》所展现出的自唐代以来直至明代初期该宗族族人外出经商从工的经历,跨越千年,可以构成前述众多东南族商在明清时期发展的完整的历史背景。对于《郑氏族谱》中郑芝龙家族进行海上贸易活动及其兴衰的分析,体现出在特定时间、特殊人物身上所承载的具有一般性意义的乡族文化特征。

由对东南族商的区域经济个案的研究,拓展到对整体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关系的再思考,作者在《第九章 结语:题外的思考》中又重新回到了对东南地区经济史区域特色的探讨。书中东南沿海地区的族商个案,大都身处以闽台海峽两岸间的商业贸易为核心,进而连接国内市场以至国际市场的海洋格局之中。由此形成的“环闽台海洋经济圈”超越了国界和陆地与海洋的界限,相对于诸多对于“大中华文化圈”讨论的流于概念,本书中对“环闽台海洋经济圈”的考察则承载于诸多东南族商真实的人生实践中,无疑为今后的区域经济史研究打破思维定式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方向。

作者对东南族商不同侧面的分析,实则引导我们对区域进行细致考察基础上的宏观思考。与东南族商以乡族、家族的血缘、地缘关系来建设商业信用机制的同时被提及的,是关于中国古代国家在规范商业社会方面的制度性缺失问题;对于各族商家族普遍存在的经营范围

和财产结构的多样化,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商品经济与农业经济共生共存的多元经济价值观;一些商业家族不断适应经济形态变迁的“弹性”特征,亦可看作是对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结构”的回应。诸如此类的问题意识与解答路径,贯穿始终。

《民间文书与东南族商研究》在对民间文书资料的运用上亦体现出很强的示范意义。基于作者二十余年来在民间文书的收集和研究方面的经验,书中对东南族商各种谱牒、契约文书收集和甄别所体现出的系统性本身已是很大的成就。明代《鉴湖张氏族谱》的保存更是具有相当独特的史料价值。作者注重族谱资料、契约文书在丰满历史叙述方面的整体效果而不是个别的文献价值,着力将一族的“小历史”叙述纳入到“大历史”叙述的轨道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民间文书内容和格式上的雷同性和主观色彩。如将泉州黄氏郊商从康熙到光绪期间赴台经营的兴衰,与其时清政府设立海防官署等制度变迁以及近代中国变局的影响相结合,可看出如何从民间文书的文本表达中把握时代发展逻辑的研究方式,使一个商人群体的描述变得血肉丰满。

当然,由于本书对东南族商进行个案研究并独立成章的体例所限,其在一些重要概念的阐述方面往往令人有意犹未尽之感。这并不妨碍我们将本书中对于商人及其资本内部构造的分析与政治文化变迁互证的理论路径,看作中国古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史研究领域宏观思考与个案研究整合的典范之作,毕竟“只有整合的历史才能使我们穿越现时,看到那已逝去的我们不熟悉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运用这种对那个已逝世界的知识,与当今世界做出对比,从而加深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这才是历史学家最伟大最崇高的目标。”